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动态演进

郑爱翔，李肖夫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摘　要：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支撑作用。研究通过构建二元 logit 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为主线，进行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能力演进特征显著，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作用呈下降趋势，方法能力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网络能力的作用呈相对稳定趋势。从策略上看，应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系统性开发；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重点性突破；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别化开发方案。

关键词：职业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9)01－0033－11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中坚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因素中，职业能力起到基础性支撑作用，具有职业能力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成职业迁移，实现职业成长。

一般而言，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生存”和“发展”两个职业阶段[1]。在早期“生存”阶段，就业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中，职业能力主要表现为以技术型能力为主的就业能力，具有一定的就业能力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适岗，对促进其实现地域迁移和行业迁移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实现就业，进入到“发展”阶段，职业成长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新的目标。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作为职业成长的基础，职业能力是否遵循一定的演进路径？通过何种演进路径动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策略，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将遵循其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职业成长脉络，分析其职业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动态演进路径，并据此提出系统化开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相应对策。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理论评述

“农民工”属于本土研究的特定术语。从理论渊源上看，对于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可溯源至国外学者的“劳动力迁移理论”研究。其中，刘易斯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后经费景汉—拉尼斯完善，形成了“刘—费—拉”模型，再经乔根森等人的发展趋向于成熟，这一整套理论系统地解释了如何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平衡增长的理论问题。我国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研究正是基于我国独特情境对上述理论的延续。

职业能力理论是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分支。德国的关键能力结构研究、澳大利亚的能力标准

收稿日期：2018－10－18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9.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GL153)

作者简介：郑爱翔(1979—)，男，江苏东台人，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开发。E－mail：aixiangz@163.com

框架、英国的权威性职业能力结构以及美国的综合职业能力研究各成一派。其中德国的关键能力结构汲取了格式塔心理学和理性主义的精华,在学术界备受推崇,所提出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职业能力构建的主要范式模型。我国对职业能力的理论研究晚于西方,徐国庆[2]认为职业能力属于工作任务的胜任力范畴,指出职业能力是工作任务在职业心理中的映射。姜大源[3]认为职业能力是一个集成性系统,指向经验上难以直接观察的行动、思维和态度模式。周衍安[4]则认为职业能力是纵向和横向多种心理成分的集合。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在吸收西方研究的基础上对职业能力的内涵进行本土化修正和完善。

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研究是劳动力迁移理论和职业能力理论耦合的结果。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职业主体,该职业主体身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变迁进程中,其职业能力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要完成由传统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使得与一般职业主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内涵尤为丰富。早期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研究始于对其技术型能力的研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具有一定的、适应于特定岗位需要的技术型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完成择业和就业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沙占华,赵颖霞[5]指出单一的技术型能力仅能满足农民工的就业需求,已难以满足其深层次的职业转换需要。罗冬林[1]则进一步提出应将可持续就业能力等纳入职业能力体系的政策建议。上述观点更符合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不过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还是围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截面进行静态结构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与市民化进程中职业成长的动态融合性研究还缺乏足够关注,尤其对职业能力如何通过动态演进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进而促进其市民化的机理和脉络尚不明晰。鉴于此,本文将以此为突破口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动态演进路径和演进机理。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理论框架

(一)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作为基础性就业能力,专业能力是完成上述职业成长过程中一系列特定岗位任务的技术型能力总和,该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地域迁移和职业迁移应具备的基本职业能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6]在对湖南慈利的调研中发现提升农民工的专业素养和就业技能既有利于个人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此处就业技能构成专业能力的主要内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良好的专业能力既是从事非农职业的条件,更是胜任现有工作的基石。在新生代农民工从业之初,专业能力尤为重要,这是满足早期操作型、业务型一线岗位需要的操作性基本能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完成职业迁移并进入职业成长阶段,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获得职位晋升,并从事和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中开始呈现一定的非技术型特征,这一变化会影响专业能力在整体能力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可以认为,尽管专业能力作为"面向工作的能力"这一内核相对稳定,但在不同的职业成长阶段专业能力在职业能力体系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作用呈下降趋势。

(二)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对于处于职业上升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专业能力仅仅是基于特定岗位的基础性就业能力,是黏着于特定岗位的静态职业能力。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新生代农民工将面对更为动荡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环境,只有具有一定的方法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市民化进程中的职业成长新常态。方法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向学习的能力、面向发展的可迁移能力,因此亦可将方法能力归为适应职业横向和纵向发展的动态职业能力范畴。沙占华,赵颖霞[5]认为学习能

力以及职业信息的搜寻、判断能力有助于提高自身竞争力，能够促进职业晋升。张雪英[7]认为可持续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等新型能力是农民工适应工业 3.0 发展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包括上述能力在内的方法能力既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上升期形成跨岗位职业胜任的基础，更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动态环境下职业成长新常态的重要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方法能力的作用呈上升趋势。

（三）新生代农民工网络能力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化过程与市民化进程是同步的过程，对于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职业成长不能脱离所嵌入的特定市民化社会网络情境，因此需要具有满足其市民化进程中建立、嵌入和管理职缘、乡缘和亲缘的多维网络的网络能力，这一能力同样属于可迁移能力的范畴。张秀娥[8]认为网络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过程中的常驻能力。芮正云[9]认为该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与各类职业主体进行资源输入和输出，进而赢得职业资源的能力。曾湘泉[10]通过对农民工等职业主体的调研，系统化提出软技能概念范畴，强调人际等类型能力在职业能力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一般职业主体相比，工作、生活均在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复杂社会网络中，与一般群体相比具有更强的社会网络意识。其中在职业成长初期，新生代农民工依赖于乡缘网络来发现和寻找职业机会。不过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层次市民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需要超越传统乡缘网络，进一步延展其社会网络规模边界；另一方面还需要从质量方面加强对现有网络的管理，并将其转化为后续职业成长的触发点。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网络能力的作用呈相对稳定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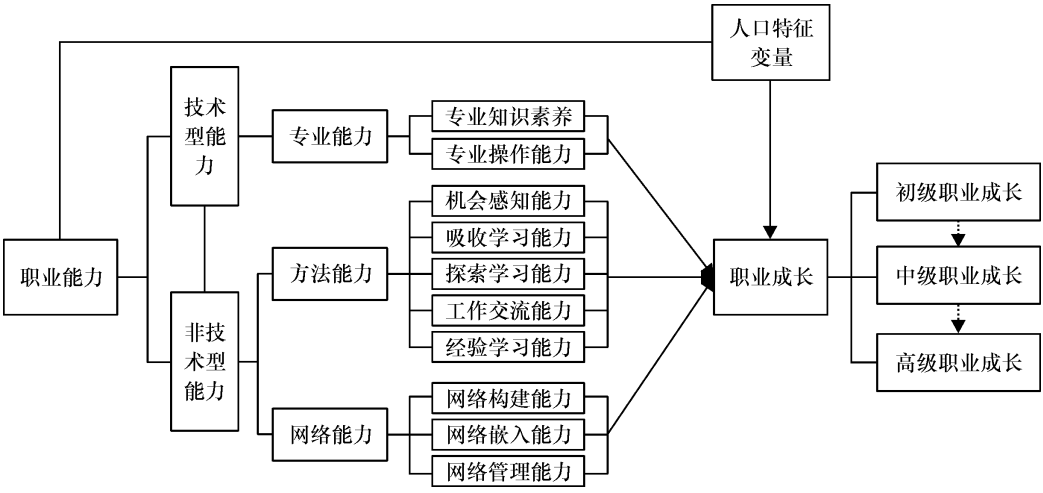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模型图

总体而言，各类型职业能力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基础，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渐次消长，动态演进。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达 5387 万人，超过国内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且我国农民工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

鉴于此,在目标调研区域和行业上,本研究特别选择在该区域内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制造业企业进行调研。在目标调研被试选择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以及刘传江[11]等国内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界定的建议,本研究选择的样本均为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通常遵循特定的职业发展轨迹[12]。周化明[13]采用广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概念,明确指出制造业企业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岗位通常以初级农民工为起点,其间涵盖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以及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等各岗位级别。由于这一分类方式能够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脉络,因此在具体的调研方法上,研究小组选定目标企业后,借鉴上述岗位划分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通过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最终发放问卷 1014 份,回收 925 份,问卷回收率为 91.22%,其中有效问卷 815 份,有效问卷率占 88.11%。由于问卷发放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为防止问卷样本中存在响应偏差,根据 Kanuk 等[14]的建议,将前期和后期回收的问卷样本进行了比较。通过结果比较发现,两组样本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表明回收样本中不存在响应偏差,在后续实证研究过程中可以将相关样本合并后再进行测量。

通过对回收的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发现,其中 460 份来自于一线业务岗位,包括工人、业务员等,占比 56.4%;158 份样本来自于基层技术或管理岗位,包括班组长、段长、线长、基层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等,占比 19.4%;145 份样本来自于中层技术或管理岗位,包括正副车间主任、职业部门主管、项目经理和工程技术负责人等相关岗位,占比 17.8%;52 份样本来自于高层技术或管理岗位,包括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等企业管理层领导岗位,占比 6.4%。

(二)变量选择

为了保证在测量过程中的效度和信度,本研究的主要测量题项主要借鉴现有量表进行设计。为了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在初始量表形成后进行了两阶段量表优化。首先邀请本领域内的教授和博士等专家对量表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审阅,并根据专家意见对量表题项的适切度、重复度等问题进行了调整。在本轮审阅和优化完成后,邀请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预测试,根据测试反馈结果对题项表达的准确性和易读性进行了修正。

1. 被解释变量

职业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支持并持续驱动其职业成长的基础[6],职业成长自然成为观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演进的良好参照物。Nkereuwem 以“提升到更高岗位的机会”来衡量职业成长[15]。Carmeli[16]认为职业晋升是职业成长的核心,能够同时体现职业主体的职业流动(career mobility)和职业前景(career prospects)。翁清雄等[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职业晋升等内部职业进展是职业成长的核心构成。由上述学者观点可知,职业晋升是职业成长的显性形态。

以在制造业从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例,职业晋升涉及初级农民工、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以及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共计 4 类岗位,包括由初级农民工向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的初级职业成长,由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向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的中级职业成长,以及由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向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的高级职业成长三种状态构成[13]。此处被解释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岗位状态,具体而言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初级职业成长阶段、中级职业成长和高级职业成长中“高”、“低”级别的两类岗位状态。在特定的职业成长阶段中,设定高阶岗位为“1”,低阶岗位为“0”。

2. 解释变量

本文在职业能力变量的选择上主要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并进行本土化修正的基础上进行设置。解释变量采用 Likert5 级量表进行变量测量设定,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其中职业能力量表中的专业能力主要借鉴 Ahmed[18] 的量表，从专业知识素养和专业操作能力两方面测量，包括“具备专业文化知识”和“掌握工作技能”等题项。方法能力主要借鉴 Wilhelm[19] 的能力动态性思路和量表，从机会感知能力、吸收学习能力、探索学习能力、工作交流能力和经验学习能力五方面进行测量。包括“定期思考职业环境变化”、“技术知识迅速应用”、“善于学习新知识技能”、“通过讨论解决问题”和“获得很多经验”等题项。网络能力主要借鉴芮正云等[9] 的量表，从网络构建、网络嵌入和网络管理能力三方面进行测量。包括“老乡和职场伙伴很多”、“与老乡和职场伙伴保持密切联系”、“与老乡和职场伙伴相互提供资源” 等题项。

3. 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外，李后建[20] 等学者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年限等变量会对职业成长产生影响。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建议和思路，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解释职业能力演进与职业成长的关系，本研究在后续检验中将上述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观测，从而可以更加完整地分析和研究各变量间的理论联系。

在确定上述变量的基础上，本研究最终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参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一线生产或业务人员—>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职业成长	初级职业成长	0.25	0.43	–	–	–	–
	中级职业成长	–	–	0.49	0.50	–	–
	高级职业成长	–	–	–	–	0.26	0.44
人口特征	年龄	3.23	1.19	3.64	1.28	4.13	1.12
	学历	2.87	0.87	3.33	0.86	3.29	0.91
	工作年限	3.78	1.22	4.12	1.18	4.56	0.96
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	3.35	0.80	3.52	0.76	3.56	0.73
	专业操作	3.60	0.68	3.69	0.69	3.83	0.64
方法能力	机会感知	3.90	0.58	4.02	0.55	4.17	0.52
	吸收学习	3.88	0.59	4.02	0.51	4.03	0.54
	探索学习	2.64	0.82	2.60	0.77	2.61	0.78
	工作交流	3.89	0.60	4.12	0.53	4.23	0.51
	经验积累	3.88	0.63	4.06	0.57	4.11	0.56
网络能力	网络构建	3.45	0.77	3.79	0.59	3.92	0.61
	网络嵌入	3.46	0.84	3.74	0.64	3.86	0.69
	网络管理	3.34	0.58	3.51	0.55	3.61	0.53

（二）模型设定

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作为研究主线，聚焦于职业能力演进问题，重点从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网络能力三方面着手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动态演进模型。本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职业成长”是按照“高阶岗位”、“非高阶岗位”设定的二分变量而非连续变量，因此适宜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P_i = F(a + \sum_{j=1}^{m} \beta_i x_{ij}) \tag{1}$$

式(1)中 a 为常数项，m 表示解释变量的数量，P_i 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概率，x_{ij} 表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 i 职业成长的第 j 个职业能力解释变量，β_j 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中，通常将事件发生的概率与未发生的概率，称为 *odds*（比值），此处 *odds*

为“高阶岗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概率与“非高阶岗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概率之比。在获取 *odds* 值的基础上，取对数并进行 Logit 转换，获得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Logit(P) = \ln(\frac{P}{1-P}) = a + \beta_1\chi_1 + \beta_2\chi_2 + \cdots\beta_i\chi_i = a + \sum\beta_i\chi_i \quad (2)$$

式(2)中 P 为职业成长中高阶岗位，即获得晋升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概率，$1-P$ 为非高阶岗位的概率，$x_1, x_2 \cdots\cdots x_n$ 为本文设定的职业能力因素。该模型可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职业能力影响因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模型虽然能够解释影响某一类高阶岗位与某一类低阶岗位的关键职业能力因素，但是并不能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在多层级岗位递进过程中的职业能力变化和演进路径，因此为探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能力演进路径，需要构建具有并列关系的多个二元 logit 模型。该组合模型在各次测量中并非一直以职业成长中的初始岗位作为参考类别，而是将每次测量中的较低阶岗位作为参考类别。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构建一线生产或业务人员与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的初级职业成长二元 logistic 模型，其次构建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与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的中级职业成长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而构建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与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的高级职业成长二元 logistic 模型。通过三个二元 logit 模型检验在职业成长各阶段的关键职业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演进路径的归纳和凝练，分析其职业能力演进过程中的规律。

四、职业能力对职业成长的影响分析

(一)研究结果

由表2所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初级职业成长阶段，即一线生产或业务人员向基层技术或管

表 2 职业能力对初级职业成长的影响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初级职业成长（一线生产或业务人员—>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β	Exp(β)
人口特征	年龄	1.058***	2.879
	学历	0.229*	1.258
	工作年限	-0.041	0.960
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素养	0.107*	1.112
	专业操作能力	0.053	1.054
方法能力	机会感知能力	-0.091	0.913
	吸收学习能力	0.126	1.135
	探索学习能力	0.083	1.087
	工作交流能力	0.017	1.017
	经验积累能力	0.002	1.002
网络能力	网络构建能力	0.238**	1.268
	网络嵌入能力	0.013	1.013
	网络管理能力	0.060	1.062
	cons	-6.807	0.001
	Wald chi^2	65.302	
	Prob > chi^2	0.000	

注： * 表示 $p<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理人员发展阶段，人口特征变量、专业能力变量和网络能力变量中各有部分二级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人口特征变量中的学历变量 β 值为 0.229，P < 0.1，年龄变量 β 值为 1.058，P < 0.001，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学历和年龄变量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初级职业成长。在专业能力变量中，专业知识素养 β 值为 0.107，P < 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专业知识素养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阶段的成长。在网络能力变量中，网络构建能力 β 值为 0.238，P < 0.01，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网络构建能力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初级职业成长的重要变量。此外，该阶段方法能力对初级职业成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由表 3 所示，在中级职业成长阶段，即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向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发展阶段，人口特征变量、专业能力变量、方法能力变量以及网络能力变量中同样各有部分二级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人口特征变量中的学历变量 β 值为 0.410，P < 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学历因素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中级职业成长。在专业能力变量中，专业知识素养 β 值为 0.173，P < 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专业知识素养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中级职业成长。与初级职业成长阶段相比，方法能力变量是本阶段新增加的影响变量。其中，机会感知能力 β 值为 0.152，P < 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于职业机会和商业机会的感知力能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中级职业成长；工作交流能力 β 值为 0.237，P < 0.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工作交流能力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中级职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网络能力变量中，网络构建能力 β 值为 0.195，P < 0.1，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网络构建能力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初级职业成长的重要变量。

表 3　职业能力对中级职业成长的影响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中级职业成长（基层技术或管理人员—>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β	Exp(β)
人口特征	年龄	−0.254	0.776
	学历	0.410*	1.507
	工作年限	0.242	1.274
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素养	0.173*	1.189
	专业操作能力	−0.017	0.983
方法能力	机会感知能力	0.152*	1.165
	吸收学习能力	−0.149	0.862
	探索学习能力	0.080	1.083
	工作交流能力	0.237**	1.268
	经验积累能力	−0.123	0.885
网络能力	网络构建能力	0.195*	1.215
	网络嵌入能力	−0.126	0.882
	网络管理能力	0.004	1.004
	cons	−4.824	0.008
	Wald chi^2	32.447	
	Prob > chi^2	0.000	

注： *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由表 4 所示，在高级职业成长阶段，即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向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发展的阶段，四类变量中同样各有部分二级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人口特征变量中的年龄变量 β 值为 −0.562，P < 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高级职业成长具有一定的负

向影响。在专业能力变量中,专业知识素养和专业操作能力的 P 值均高于 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专业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级职业成长影响不够显著。通过与初级和中级职业成长的比较,这一结果说明在高级职业成长阶段,专业能力的影响力趋势减弱。在方法能力变量中,机会感知能力 β 值为 0.501,P <0.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高级职业成长需要对职业机会和商业机会敏锐的感知力;探索学习能力 β 值为 0.215,P <0.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探索学习能力也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高级职业成长的重要变量。在网络能力变量中,网络管理能力 β 值为 0.357,P <0.1,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网络管理能力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初级职业成长的重要变量。通过将这一阶段网络能力与前两个阶段进行比较,还发现在本阶段网络管理能力取代网络构建能力成为促进高级职业成长的因素。

表 4 职业能力对高级职业成长的影响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高级职业成长(中层技术或管理人员—>高层技术或管理人员)	
		β	Exp(β)
人口特征	年龄	-0.562*	0.570
	学历	0.353	1.424
	工作年限	0.460	1.585
专业能力	专业知识素养	-0.074	0.928
	专业操作能力	-0.162	0.850
方法能力	机会感知能力	0.501**	1.650
	吸收学习能力	-0.195	0.823
	探索学习能力	0.215*	1.240
	工作交流能力	-0.195	0.823
	经验积累能力	-0.046	0.955
网络能力	网络构建能力	0.154	1.166
	网络嵌入能力	0.037	1.038
	网络管理能力	0.357*	1.429
	cons	-5.468	0.004
	Wald chi^2	46.583	
	Prob > chi^2	0.000	

注: * 表示 p <0.1, ** 表示 p <0.01, *** 表示 p <0.001

(二)研究结果分析

由实证研究结果可见,三类职业能力中的专业能力和方法能力对职业成长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消长态势,网络能力在不同职业成长阶段影响稳定,但网络能力内部存在一定的此长彼退(参见图 2)。

1. 随着职业成长的深入,专业能力的影响趋于下降。其中,专业知识素养对初级职业成长和中级职业成长具有显著性,对高级职业成长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专业知识素养仅对初、中级职业成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专业操作能力则对各阶段职业成长影响值都不具有显著性,该结论的形成与专业操作能力的特性具有密切联系。由于专业操作能力多为技术型能力,对于职业上升通道中的各岗位而言,工作内容已不同于早期的业务岗位,其非技术型能力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专业操作能力在各阶段职业成长不具有显著性。进而言之,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情境中,专业操作能力优良与否是作为岗位胜任标准,而非作为晋升标准。综上,假设 1 通过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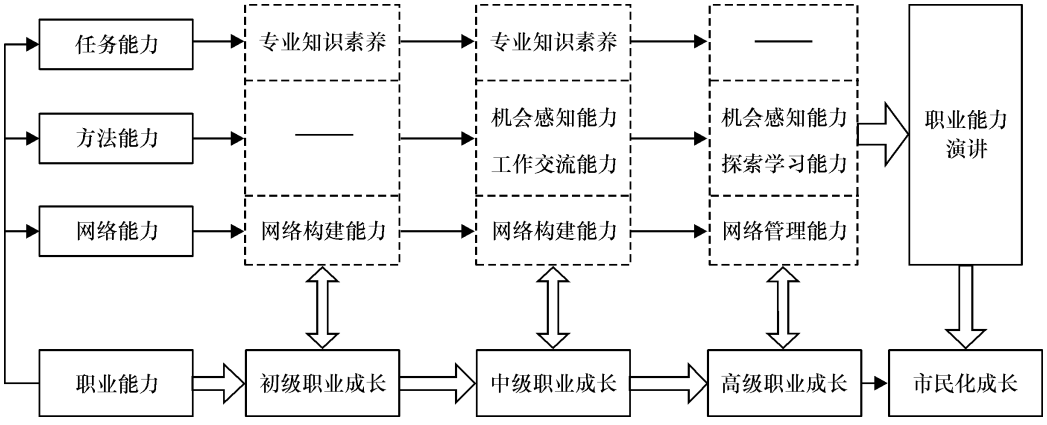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职业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动态演进

2. 方法能力对职业成长的显著性影响始于中级职业成长阶段，在后续职业成长中演进趋势逐渐清晰。机会感知能力、工作交流能力和探索学习在不同的职业成长阶段呈现不同的影响特征。其中，方法能力中的机会感知能力对初级职业成长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机会感知能力有助于促进中级和高级职业成长，这与中高级职业成长中的相关岗位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与基层岗位相比，中高级职业成长中的相关岗位需要具有较强的抽象能力和前瞻能力。探索学习能力对高级职业成长影响显著，这同样是由高级职业成长中相关岗位的复杂性工作内容所决定的，大量的例外管理和不确定性管理渗透于高级岗位的日常工作中，这要求其具有较强的探索学习能力。从结果还能够看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中级职业成长中，工作交流能力更为重要。这是由于与其他类型的管理者相比，中级管理者需要兼具更强的由上而下的指挥协调能力，以及由下而上的汇报和沟通能力。此外，吸收学习能力和经验积累能力对各阶段职业成长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这两类能力在各阶段职业成长中重要性相同，不具有显著的区分度。综上，假设 2 通过验证。

3. 网络能力是三类职业能力对职业成长影响相对稳定的能力，不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过程中，网络能力呈现由量变向质变的演进趋势。其中，网络能力中的网络构建能力对于初级和中级职业成长影响显著，能够促进初、中级职业成长，但是在高级职业成长中，网络构建能力不具有显著性。网络管理能力仅对高级职业成长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对初级和中级职业成长影响不显著，网络构建能力和网络管理能力对不同职业阶段的职业成长影响具有的作用不一。这说明初、中级职业成长主要依赖于网络能力“量”的提高，而高级职业成长则依赖于网络能力“质”的提升。此外，网络嵌入能力在各阶段职业成长中影响值均不显著，说明网络嵌入能力在各阶段职业成长中影响相对平稳，不具有特异性。综上，假设 3 得到验证。

五、研究启示

本文基于职业成长实证研究视角，通过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以下研究启示。

（一）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系统化开发

由研究结论可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中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网络能力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不同职业成长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前市民化阶段，一般通过就业培训班、订单班、岗前和入职培训等多种形式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获得职业能力，不过这一阶段主要是以专业能力为主的职业能力开发。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实现就业，职业成长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职业目标，这一过程与市民化进程是同步的。从职业成长规律来看，随着职业

的向上发展,其技术型能力的主体能力地位会逐步让渡于非技术型能力。因此,只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网络能力进行系统化开发和能力投入,平衡发展其技术和非技术型能力,才能更好地促进其职业成长,进而满足其市民化成长需要。

(二)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重点性突破

由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各类型职业能力的边际效应各有差异,呈现多样化的演进特征。鉴于此,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职业成长阶段,应根据职业能力的动态演进特征进行相关职业能力的重点突破。

在初级职业成长阶段,专业知识素养、网络构建能力是开发的重点,这与这一阶段的岗位特点具有密切联系。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作为技术型能力,专业知识素养在基层管理和技术岗位中仍然具有很强的区分度,同时结果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具备一定的网络构建能力方能支撑其初级职业成长。在中级职业成长阶段,专业知识素养、机会感知能力、工作交流能力和网络构建能力是关键职业能力。与初级职业成长阶段需要的职业能力相比,机会感知以及工作交流能力是处于这一职业上升阶段的农民工的"新型"能力。在高级职业成长阶段,机会感知能力、探索学习能力和网络管理能力是这一阶段的重要驱动力量,而专业知识素养和网络构建能力在这一阶段不再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说明进入到高级职业成长阶段,技术型能力开发不再是进行职业能力投入的重点,应加强对方法能力和网络能力的开发;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阶段要重视对网络管理能力的开发和培养,高质量地整合和管理社会网络对于自身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别化开发方案

三类职业能力具有不同的职业能力特征。其中专业能力具有较强的技术型能力特征,方法能力和网络能力则具有一定的非技术型能力特征,上述能力特征的不同决定了能力开发方案的差异。

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面向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能力开发体系,以短期培训和中长期学历教育为主要形式,主要由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和高校等教育培训主体协同推进。与专业能力相比,专业能力和网络能力是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迁移性职业能力。这两类能力本身并不附着于特定的工作岗位,在开发过程中涉及对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重构和优化,因此需要长期性、系统性的终身职业教育加以开发和培养。根据西方的经验,在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上可以将社区与传统教育主体相对接,通过建立跨"生活—工作"环境的职业教育联合体的方式,形成贯穿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终身职业能力提升体系。其中,企业与社区协同的"企业—社区"教育平台,职业院校、教育机构与社区协同的新型社区学院是亟待探索的组织架构形式。

参考文献:

[1]罗冬林. 新生代农民工可持续就业能力系统的反馈动态复杂性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4(15):106-109.
[2]徐国庆. 职业能力的本质及其学习模式[J]. 职教通讯,2007(1):24-28,36.
[3]姜大源. 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理论、实践与创新[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周衍安. 职业能力发展和职业成长研究[J]. 职教论坛,2016(10):61-64.
[5]沙占华,赵颖霞. 自我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J]. 农村经济,2013(8):112-115.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王阳. 慈利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调查[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3(1):85-90,95.
[7]张学英. 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变迁及技能发展应对[J]. 教育学术月刊,2018(3):42-51.
[8]张秀娥,金兰,王西. 网络能力对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J]. 学习与实践,2016(10):45-49.
[9]芮正云,庄晋财. 农民工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J]. 财贸研究,2014,25(6):30-37.

[10]曾湘泉. 中国就业战略报告 2008 - 2010："双转型"背景下的就业能力提升战略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刘传江.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 人口研究，2010，34(2)：34 - 39，55 - 56.
[12]周彦兵.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基于生命历程理论[J]. 职教论坛，2016(23)：27 - 32.
[13]周化明. 中国农民工职业发展问题研究[D]. 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2.
[14]KANUK L，BERENSON C. Mail surveys and response rates：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75(12)：440 - 453.
[15]NKEREUWEM E E. Job performance attributions and career advancement prospects for women in the academic libraries[J]. Librarian Career Development，1996，4(1)：18 - 24.
[16]CARMELI A，GEFEN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commitment models and employee withdrawal intentions [J].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005，20(2)：63 - 95.
[17]翁清雄. 职业成长对员工承诺与离职的作用机理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18]ABDEL - HALIM，AHMED A. A reexamination of ability as a moderator of role perception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 [J]. Personnel Psychology，1981，34(3)：549 - 561.
[19]WILHELM H，SCHLÖMER M，MAURER I. How dynamic capabilities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operating routines under high and low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5，26 (2)：327 - 345.
[20]李后建，卞小娇，尹希果. 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就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危机影响下返乡农民工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10(3)：62 - 70.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ZHENG Ai-xiang，LI Xiao-fu
(*Management School*，*Wu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xi* 214000，*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 play basic supportive roles. Based on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this study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areer growth. The study finds that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significant.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is decreasing；the role of method capability is increasing，while the role of network capability is relatively stable. From the strategic point of view，we should systematically develop the 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identify the key 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 that promote career growth at all stages，and design strategies accordingly；follow the rules of the evolution of 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design differentiated 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 development programs.

Key Words：occupational capabilities；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career growth；citizenization